

贫穷的谎言——因愚而穷？

理自  -3152626835

“贫穷源于愚蠢”、“你穷是因为你太笨”、“智商高的人赚到钱是应该的”，也许这些话你在生活当中都听过；也许你对这些意识形态语言深信不疑。无论如何，我们不得不承认，关于智商与贫穷的流行性话语的确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现代以来最大的、却也最有欺骗性和蛊惑性的谎言之一，而它的辐射范围也远远不止西方世界。

这套理论起源于上世纪 60 年代的保守主义运动，而后在 90 年代中叶随着一本由两位生物学家所写的《钟形曲线：美国生活中的智力和阶级结构》的流行科普书籍成为了西方保守主义阵营最强大的武器，它也被称为“贫富生物论”（The Biogenetic Theory of Poverty）。可以说，这本书是现代不多见的系统性地、用看似符合生物学学术标准的方法，为社会不平等现象辩护的一本“巨著”。在其出版后，由于美国各大财团和企业主的资助和背书，它的影响力逐渐已经超过了这本书本身，而与人类社会长期以来的各种偏见、刻板印象和阶级话术融合，最终成为了整个世界的标准意识形态语言之一。

与强调社会结构、政治生活和经济分配制度对贫富差距所造成影响的现代社会学传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些笃信社会达尔文主义和贫富生物论的保守主义学者坚信，对人们的生活前景影响最深刻的事物，不是社会结构、政治生活和经济分配制度，而是他们天生的智力水平。根据《钟形曲线》的作者赫伦斯坦的说法：现代人类社会、尤其是美国，正越来越多地被隔离成不平等的社会阶层，但这种新的阶层体系中的“决定性分裂力量”不是不平等的家庭背景和社会经济的分配制度，而是遗传的“认知能力”或者说“智商”；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的区别在本质上是聪明人和愚蠢人的区别；教育成就、职业成就和其他社会成果的不平等是由于认知能力的遗传差异，被赋予高智商的人注定是富有的，中等智商的人则被划入中产阶级，而低智商的人注定一生贫困；不管他们的出生环境如何，聪明的人会上升到顶端，而愚蠢的人则永远会在底层苦苦挣扎。最后他认为，按种族和民族划分智力分布也不均衡：黑人普遍不如白人聪明，这种智力差距是解释种族不平等持续存在的原因，而种族歧视在美国则根本不存在。

根据赫伦斯坦的说法，有两项积极的社会发展改变了美国的社会分层体系，以至于让认知能力或者说智商成为了决定经济成功的关键，最终实现了最公平的社会制度，并且应该推广到全世界。

一：现代美国实现了大规模的机会平等。这减少了种族、性别和阶级背景对个人成就和社会流动性的影响。人们现在在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中争夺上学和工作的机会。这场比赛的输赢取决于一个人为社会创造的价值，而价值主要是由一个人的智力来决定的。

二：经济的技术升级需要越来越多具有复杂认知技能的工人。今天的高科技经济重视智力，其结果是拥有必要脑力的高智商人群和不具备必要脑力的低智商人群之间的不平等日益加剧。现代“技术社会”由此产生了一个新的上层阶级，一个“认知精英”凭借其卓越的智力所垄断的阶级。

于是，对于赫伦斯坦来说，美国的阶级分化已经成为了一种认知分化：富裕

的聪明人在阶级光谱的一端，贫穷的愚蠢人则在另一端。如今让人们进入好学校和获得好工作的是智商，而不是家庭地位、继承的财富或社会关系。随着“高等教育民主化”，任何具有必要知识能力的人都可以进入大学。同样的“认知划分”也发生在职业系统中，因为工人是根据他的智商来划分工作的。

在现代的“精英政治”（Meritocracy）或者叫“英才教育”，即精英选拔、英才治理下，个人在教育和职业领域的进步程度取决于他与生俱来的思维能力——高智商导致成功，低智商导致失败。要改变这种平衡也没什么办法，至少无法在不损害经济效率和社会公正的情况下做到。

总之，天生的认知能力控制着进入教育机构和职业岗位的机会，是谁能取得成功的主要决定因素。赫伦斯坦总结到：“综合起来看，美国经济的成功和失败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越来越成为人们遗传基因的问题。”根据赫伦斯坦的说法，由于低认知能力通常与“社会不良行为”相关联，因此不太聪明的人不仅在经济流动性方面受到阻碍，他还往往会给其他人带来问题，低智商人群是大多数社会问题的根源：“有大量的国家社会政策议程是在为那些行为不端的人服务，而这些人认知能力是极其有限的，所以大量福利政策都失败了。”

这种生物决定论显然是愚蠢且荒谬的，但更关键的一一它有两个极其邪恶的、隐藏起来的意识形态假设，成为了西方资本主义秩序最强大的护教学之一。

一. **效率假说**：既然每个人的地位是由生物基因决定的，有些人天生比你聪明，他创造的价值就是比你高、就是比你有用，所以你活该很穷。你的贫穷和他人的富有是一种对资源的最大化利用。

二. **公平假说**：这个基于生物秩序的现代经济制度是绝对公平、不偏私的，人类不需要任何经济再分配制度，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你怎么做都是“福报”。走上高位的并不是因为出身或运气比你更好亦或者制度腐败，而是因为人家天生就聪明，所以我们这个制度是绝对完美的，任何的反抗都是一种不公平，是愚蠢的人企图获得更多的东西。

为了系统地批驳这种流行的意识形态观点，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将指出赫伦斯坦理论的五个关键弱点：

1. 他的论点基于机会平等的错误假设。
2. 他歪曲了智商和贫困之间的关系。
3. 他对人们如何求职进行了不切实际的分析。
4. 他未能从总体而非个体层面上认识和解决贫困问题。
5. 这套理论隐含的个人主义假设使他看不到贫困的结构性原因。

1. 机会是平等的吗？

赫伦斯坦坚持认为：在现代美国社会，每个人都可以在机会平等的条件下争夺学校和工作机会，决定成败的关键是智商和认知能力，而非家庭背景或社会地位。

然而在现实中，无论是教育体系还是职业体系都信奉“精英政治”理念，即相信所谓精英选拔、精英治理的英才化制度。儿童从他开始学习的第一刻起就遭遇了巨大的、积累的教育不平等。贫困儿童不太可能接受高质量的儿童护理，参加高质量的学前项目或受益于利于认知刺激的家庭环境。当他到了上幼儿园的年

龄时，他已经远远落后于更富裕的同龄人。一旦他进入了高度隔离的学校系统，挤进这个国家最差的教室，他就会遇到新一轮的不利条件。

虽然赫伦斯坦宣称“高等教育民主化”，但最近的大量研究表明：美国学生上大学的阶级差距越来越大，预算限制、学费上涨、经济援助减少和家庭收入停滞不前的综合因素，使得许多合格的学生负担不起高等教育。事实上，作为获得大学学位的决定因素，**金钱远比智商更重要**。

正如彼得萨克斯所言：“在美国，一个富有的低成就者比一个来自低收入家庭的高成就学生有更大机会进入大学。”此外，赫伦斯坦也没有研究劳动力市场的机会不平等。一组经济学家（Joe L. Kincheloe, Shirley R. Steinberg, and Aaron D. Gresson III, et al）利用“钟形曲线”中使用的相同数据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在相同的认知能力水平下，在美国，女性和少数族裔的工资水平明显低于白人男性，一个白人即使智商相对较低，也可能过上体面的生活，而一个女人或一个非裔美国人即使智商相对较高，也可能挣扎在贫困线上。这些经济学家总结说，关于收入的数据“与赫伦斯坦关于劳动力市场英才化的说法不一致”，证据显示，与精英政治的精英选拔、精英治理的理想相反——女性和少数种族无法像白人男性一样最大化利用他的认知能力，即使机会均等和认知能力是经济成果的主要决定因素，非裔美国人和妇女的贫困率也大大高于预期。更广泛地说，以赫伦斯坦为首的保守主义力量本质上拒绝承认生活机会是如何由“持久的不平等”构成的，也拒绝承认这种不平等是通过家庭和社会阶级传递的。

正如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的《设计不平等》一书所总结的那样：“父母的优势——财产、学习能力、个人交往、实用手艺、社交技能、文化工具等等——会传递给他的孩子，也会从一个社区的年长者传递给年轻者，同样，**劣势也在传递**。”没错，与赫伦斯坦的假设相反，无论是教育系统还是职业系统都不值得打上精英政治这个精英选拔、精英治理的标签。在获得教育和就业方面，长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穷人之所以穷，不是因为他的智力有限，而是因为他获得优质教育和获得体面工作机会有限。赫伦斯坦仅仅是希望以此淡化阶层不平等、种族和性别歧视等持续性的不利条件。

我们必须要说的是，哪怕在**部分国家**存在一种比腐朽的美国制度更先进的、更公平的，期望以“智力水平”和“学习能力”为唯一标准的阶级晋升和教育选拔手段，由于我们之前所提到的各种社会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它也不可能是**绝对公平的**。来自不同地区、家庭、身份的人，注定有着不同的起点。一个**相对进步的制度是社会进步的起点，但必定不会是社会进步的终点**。

我们更需要注意的是，当制度的设计者自己都开始着手改革一个制度时，究竟是哪些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不惜站到制度设计者和人民的对立面。

2. 智商和贫富的相关性问题

的确，在现实生活中，低智商的人比高智商的人更容易贫穷。然而，到底贫穷导致低智商，还是低智商导致贫穷？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而赫伦斯坦在处理智商和贫困关联的相关性问题时，犯了两个错误。

第一，他把智力当作原因，从不把它当作结果，他拒绝将智力视为“对社会条件的反应”。

第二，他把贫困当作结果，从不把它当作原因，他拒绝将贫困视为被塑造的

个人行为和生活路径的组合产物。

而事实是，当贫穷的孩子在贫穷的家庭中长大，他住在糟糕的房子、混乱的社区里，上最差的学校；他不得不承受营养不足的饮食和不良的身心状况；他会经历偏见、歧视和社会孤立。出身贫困的孩子们永远面临着多重的和累积的不利条件。他的一生都可能过着紧张和拮据的生活。**如果这样，他的纸面智商分数很高，那才简直是奇迹。**

可以这么说，通过淡化社会环境对认知能力的影响，赫伦斯坦可以说是忽了一个解释智商和贫困之间相关性的理论，那就是：“**并不是低智商导致地位低下；而是地位低下导致智力测试分数低。**”贫穷在本质上阻碍了认知功能的充分发展，低收入家庭往往缺乏必要的经济手段、社会支持和机构资源来充分培养其子女的能力和才能。富家子弟在智商测试的得分较高，主要是因为他在资源和机会丰富的富裕环境中长大；而穷孩子在这类测试中得分较低，主要是因为他在资源和机会匮乏的环境中长大。是的，人们的根本问题是贫穷，而不是智商。**倒果为因可以成为某些人的保护伞，但这个世界不易的真理是水滴石穿，更何况是倾盆暴雨。**

3.自由市场是万能的吗？

赫伦斯坦声称，通过自由市场的“看不见的手”的操作，个人将根据他的认知能力被分类到职业系统中，智力的差异由此转化为收入的差异——高智商工人被安排到好的工作岗位；低智商工人被安排到不好的工作岗位，如果他不是完全多余的话。这种职业分类的过程对于赫伦斯坦来说，是**统一的、客观的、理性的、不可避免的和任人唯贤的：**

统一的，因为所有雇主**评价工人的标准**本质上是相同的；

客观的，因为**筛选过程**相对没有主观判断、偏见和错误印象；

理性的，因为它使**效率最大化**；

不可避免的，因为它必然是**技术工业社会**的唯一选择；

任人唯贤的，因为它保证了能力是某些人取得领先的主要**决定因素**。

赫伦斯坦的职业分类理论进行了一个难以置信的假设：人们在劳动力市场上遭受的唯一障碍是低智商。然而，正如大量社会科学文献所显示的，独立于认知能力之外，个人可能会因其种族、民族、性别、年龄和性偏好等因素而处于不利地位。他可能会因为缺乏必要的证明渠道而被挤出工作轨道；他可能非常适合一份工作，但不知道这个工作有空缺或者这个工作需要内推资格；雇主可能会忽略有足够认知能力的候选人，因为他来自错误的社会或文化背景、有错误的证书、来自错误的社区；认知错误的人，有错误的外貌或者说话口音不正确。

每一个在找工作的人都可能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被拒绝，无论是他被认为缺乏正确的工作态度、忠诚度、纪律性、兼容性、人际交往能力或服从权威的意愿。职业分类过程太混乱了，无法想象工人主要是根据他的“一般智力”来匹配工作。一个好的贫困理论需要能够解释为什么特定的个人会在劳动力市场上失败，而认为这仅仅是一些人智商低的问题是不可信的。但这可以成为一个称职的**意识形态谎言**。

4. 个人主义为什么是错的

最后，《钟形曲线》暗含了一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那就是一种自由主义视角下的、微观性的“个人主义偏见”。在这种偏见的影响下，研究者会预先将贫困、失业等社会问题描述为可以由单一个体主观性控制的“社会行为”（social behaviors），而不是超出单一个体掌握的社会条件（social conditions）。由此，贫困便成为了纯粹是由个人不当行为引起的个人问题，与社会的结构和功能无关：贫困是低智商人群陷入的困境，因为低智商人群在学校和工作中无法与高智商人群竞争，并且容易做出错误的选择和自我毁灭的行为，与其说贫困是社会的一种状况，不如说它是个人低下的禀赋和越轨行为的一个结果。

然而，从这点来看，这套理论完全放弃了作为一个学术理论的严谨性，而成为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传声筒，因为它的个人主义偏见放弃了学术研究最基本的对变量条件和更广义的科学方法论的尊敬。在《钟形曲线》的作者赫伦斯坦看来，像贫困这么复杂的现象居然可以归因到一个简单的单一变量身上。他不仅否认家庭环境对人们经济成果的影响，还要求我们相信贫困发生率与经济状况或政府社会福利和劳动力市场政策无关。

如果他是真心相信这一点而非出于利益驱动而写下这本书，那这便是一件极可悲的事情。也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先入为主的观点，赫伦斯坦从一开始就放弃了结构性把握贫困问题的方法路径，纯粹从个体的微观视角上去认识“贫困”这个现象，这便很难不得出错误的结论。

5. 贫困为什么必须是一个总体理论

《钟形曲线》所代表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最具压迫性的一点是，它只关注单一个体的贫困成因而拒绝提供一个关于贫困和不平等的总体性理论。换句话说，它希望让所有人关注“一个人”为什么会贫穷，就仿佛贫穷是“一个人”的行差踏错所带来的悲剧性结果，或者说只会发生在“一个人”身上。但事实绝非如此，贫穷在全球范围内，都是一个群体性的、阶级性的现象。

因此，西方保守主义理论不能解释为什么贫富差距如此之大；为什么处于职业系统底端的人的劳动报酬比高端的人低得多；或者为什么工人每小时挣 8 美元而不是 16 美元。它无法解释美国经济中，数百万工人的工资为什么仍远低于最低生活工资，也无法解释为什么一些国家的普通人极其努力也无法赚到美国的最低工资标准——这显然不是遗传学的问题。

事实上，赫伦斯坦理论的缺陷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个人的缺陷本身并不会导致人们变穷，或者说在决定贫富的那些要素里，个人的缺陷和优势从来都不是最关键的。例如，在经济繁荣时期，一个没有多少技能的人可能很容易过上体面的生活，但是在经济萧条期间，随着工作变得稀缺，同一个人可能最终会失业并进入穷人的行列。

低智商或任何其他个人层面的特征是否会导致贫穷，取决于市场上是否有收入体面的工作。生物遗传理论或许可以预测当经济不景气时谁可能会陷入贫困，但它无法解释贫困率随时间的波动，也无法解释这些波动背后的经济繁荣或萧条的原因。

美国的贫困率从 1989 年的 12.8% 下降到了 2000 年的 11.3%，是因为那个时期美国人平均智商激增吗？而为什么在 2000 年以来，贫困率一直在上升？是不是因为美国人的平均智力比其他发达国家的人低很多，所以美国是发达国家中贫困率最高的国家。

我们必须承认，尽管有一部分人的能力和技能不如其他人，但我们是否在贫困线上挣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政策、总体经济局势和家庭的经济状况。

在最后，我想再进一步批判赫伦斯坦对“智力”这个概念所做论断的学理错误，即指出这套理论哪怕不放在更广阔的社会学框架下，在一般的认知科学、生物学和心理学的基礎上，它也是漏洞百出的。

6. 什么是智力？

“钟形曲线”对人类智力的判断主要由四点组成：

(1) 智力是一个单一且统一的现象，即所谓由“核心人类心理能力”组成的“一般智力”，这是所有形式的“复杂脑力劳动”的基础。

(2) 标准化智力测试提供了对一般智力的精确测量，使得根据个体的认知功能能力对其进行线性分级成为可能。

(3) 智力是“强遗传的”，在个体认知能力的构成中，基因占 40%~80% 的比重。

(4) 人拥有一个基本上不可改变的、出生时就决定的智力水平。社会和教育干预不能明显提高低智商人群的认知能力。

让我们依次批判这些具有欺骗性意识形态偏见。

首先，现代认知科学和心理学普遍认为，智力是一种多维的现象。当人类处理和认知问题时，在脑中发生的活动并不都是密切相关的，也可能都是“一般智力”的衍生物。

人可能在某些方面、某些背景下、某些任务上很聪明，但在其他方面却不聪明：有些人可能有数字的能力；有些人有文字的能力；有的可能有很好的商业意识；有的则有艺术天赋；有些人可能有课堂智慧；有些人可能有街头智慧。在一个领域带来高能力的那种智力禀赋，不一定在另一个领域有相同的回报。“一切以时间地点为转移。”个人不可能被贴上一种具有“绝对一致性”的聪明或愚蠢的标签归类。因此，他在单一智力测试上的排名不能很好地解释它的社会和经济结果。

多维论观点意味着，成功和失败，就与智力有关的程度而言，并不取决于传统智商测试要衡量的单一属性，即所谓的“一般智力”。认知能力有很多种，社会努力也有很多种，每一种都偏爱某种不同的才能和技能。因此，智商分数并不能告诉我们人们整体的实践能力，也不能左右社会和经济命运。

第二，标准化智力测试只是对成绩的直接测量，而不是能力。考生的表现可能会受到从情绪、舒适度到应试体验等任何因素的影响，这种测试只是间接测量能力。即使这样，它们测量的也是“发展后的”能力，即一种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形成的素质，而不是“天生的”能力——毕竟不可能有人能在刚出生的时候就完成智力测验。而哪怕作为后天智力的测量，标准化测试也是

有限的，因为它们只评估一组特定的应试能力，即在有时间限制的纸笔考试中与成绩相关的技能。它不太擅长测量各种形式的实用智能；日常问题中表现出的认知能力；或者个人在教室和工作场所使用的更广泛的、更依赖于背景的“智识功能”。

事实上，心理学家基思·斯坦诺维奇（Keith Stanovich）最近的研究发现：通过智商测试衡量的智力和跟广泛的理性，比如反身性、适应性决策、认知灵活性、对不一致的敏感性和对证据的反应性等心理品质之间只有小到中等的相关性，**高智商不是良好思维的必要条件，聪明的人也不能避免愚蠢的行为**。正如理查德·尼斯贝特所说，**理性思考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东西**。虽然这种学习可能不会给我们更高的纸面智商数据，但它会令我们更聪明，在某些方面也很重要。总的来说通过智商测试衡量的“智力”，并不能涵盖所有有价值的认知特征，也不能可靠的预测人们在学校、工作和日常生活中有效发挥作用的能力。

第三，很多学者认为**钟形曲线高估了智商的遗传基础和遗传率，低估了社会环境的影响**。赫伦斯坦计算遗传率的方法，以及他从中得出的结论夸大了认知能力是一种天生的、不变的特质，以及智力从一代遗传到下一代的程度。虽然他声称智商的遗传率可能高达80%，但其他研究在收集了更广泛的数据后表明这个数字要低得多，在30%到50%之间。

然而，现实情况甚至更复杂，因为**基因的重要性取决于社会背景**，例如对于在贫困中长大的孩子来说，物质匮乏抑制了智力潜力的充分发挥。的确，许多专家说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是如此紧密的交织在一起，以至于**不可能将影响按照一种百分比的实证主义手段来量化**。

第四，根据赫伦斯坦的观点，智力因为它本质上是遗传的，所以不能轻易提高，并且这样做的努力已经产生了“令人失望的结果”。他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认知能力低下的问题，不会通过外部干预，让孩子变得更聪明来解决。”当然，他也承认提高智商并非不可能，但是他认为，由于相关知识不足和“可用的社会干预手段”有限，所以这是不切实际的问题。我们并不是什么都做不了，而是“没有一种便宜可靠的提高智商的方法”。

显而易见的是，**这是一种政治判断而不是科学判断**。正如詹姆斯·赫克曼所观察到的，赫伦斯坦没有进行适当的成本效益分析来证明他的观点。更深层次的问题是，赫伦斯坦误导性地将**遗传性等同于不变性**。他错误地认为，如果智商有很大的遗传成分，那么社会改革就不能显著提高智力。但正如最新的生物遗传学研究表示的那样，**智力的可塑性不受遗传性的限制**。

此外，大量的实证证据也无法支持赫伦斯坦对提高认知能力前景的悲观看法。归根到底，对赫伦斯坦等保守主义学者来说，社会帮助和教育干预是无效的，特别在早期生活中是这样。无论我们如何增加儿童的智力，提高他从学校受益的能力，并帮助他获得技能的研究最终都是徒劳无功的。

然而，其他生物学家反驳了这一点，他认为：“**智力可以大大增加，而不需要英雄式的、极其昂贵的干预**。”例如，只要简单地改善孩子的产前环境和产妇的生理状况，就能显著提高智商。高质量的幼儿教育、拥有高素质教师的学校也能提高贫困儿童的认知技能。

其他研究表明，无论智商如何，学校教育都能改善人们的经济成果。教育政策“**有可能减少现有的和日益加剧的收入不平等**”。一切实证证据都表明，与贫富生物论相反，**人们的认知能力水平和它的社会经济命运都不是在降生时决定的，更不是不可改变的**。

在《钟形曲线》的第二部分中，赫伦斯坦声称要证明相比于其他社会因素，遗传的认知能力对人们的生活境遇有着最大的影响。在这里他通过论证智商比家庭背景、即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SES）更重要，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换句话说，他想证明社会的经济不平等，并没有对社会的整体不平等造成影响。因为社会的不平等，是由智力导致的，这和一个人的父母究竟后悔创建了阿里巴巴还是后悔进了电子厂没有一点关系。

在研究了智商和社会经济地位对各种社会行为的影响后，赫伦斯坦得出结论，智商低下，比家境差劲更容易导致辍学、失业、犯罪。换句话说，智商对社会行为的影响比家庭地位更大。因此，人们在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例如贫困和失业似乎更多是由于缺乏认知能力而不是不利的生活环境，人们在生活中表现不佳，不是因为弱势的社会地位，而是因为他智力低下。

然而，人类社会真的已经进步到如此高级、只靠智力禀赋就能实现一切公平的阶段了吗？不会吧不会吧不会吧？用一位社会学家（Lawrence Harrison）的话来说，赫伦斯坦对 SES 的概念是“无法形容的粗糙”，他的 SES 仅由四个变量组成：母亲的教育、父亲的教育、家庭收入和父母的职业地位。

这个指数即使作为家庭背景的衡量标准也是有限的，而作为估计社会和经济劣势的累积影响的工具，它更显得狭隘。这个指数排除了各种重要的社会变量，这些变量基于受访者的父母背景有关，也与受访者自己目前的经济和社会状况有关。比如家庭规模和组成、本地教育质量、当地就业机会、社区和邻里特征以及社会交往质量，甚至还有不同时代的经济机遇的差别。

你不能拿一个处于 80 年代末期的人所拥有的机遇，和一个 2022 年的人进行对比。而在使用更精准的社会经济背景测量，对赫伦斯坦的分析进行了多次复制和分析后，社会学家们普遍发现钟形曲线严重低估了社会环境对生活结果的影响。

总得来说，钟形曲线提出了一个过分简单的、却能够讨好美国大财团内部保守主义当权派的关于贫穷和不平等的社会理论：即人们贫穷是因为他缺乏足够的、由遗传决定的认知能力，因此一种严酷的达尔文主义不仅是必要的，更是有益于所有人发展的。

穷人是自身不良基因的受害者，而社会和教育干预对解决穷人基因这个问题无能为力。事实上。只要这个观点只要再进一步发展，就和二战中各种甚嚣尘上的种族主义理论没有任何差别了。很难想象这样一套论调在新世纪初的美国仍然能为人所推崇，而其在流行领域的变种甚至成为了其他国家一些借助时代红利崛起的精英，用来自我加冕的堂而皇之的借口。

的确，所有人都承认这个世界存在着许多差异和不平等。其中最显著的就是贫富之间的差异以及贫富差异带来的人生际遇的改变。当社会学家被要求解释这种差异时，他必须从国家、阶层、教育、社会地位等因素开始分析，并时刻要求自己足够多的变量保持敬畏。但赫伦斯坦提出，人们之所以贫穷，原因很简单，他天生就缺乏具有竞争力的认知能力。这种对贫穷的看法以及作为其基础的更普遍的不平等生物遗传理论在许多方面都有缺陷，我不想在这里总结钟形曲线的众多弱点，但我要重申四个关键问题：

首先，赫伦斯坦自己的统计结果得到了后续研究的推翻。数据表明智商的差异只占个人工资和收入差异的很小一部，分约为百分之十。人的经济地位是否不同或是否容易陷入贫困，原因有很多，认知能力无论是否遗传远不是主导因素，在决定人们的生活结果中起着相对较小的作用。

其次，认知能力和贫困之间的因果相关性研究比任何事都更能证明社会和经济窘迫对孩子考试成绩的影响。贫富生物理论夸大了智商对贫穷的影响，低估了贫困对智商的影响。

第三，与《钟形曲线》假设相反，研究表明，社会、政治和教育政策可以提高儿童的认知能力，并可以改善他晚年的经济成果。人的一生机会不是一出生就固定的。

第四，生物遗传理论完全忽略了无数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力量。这些力量影响着资源和机会的分配、贫困率以及穷人所经历的苦难的严重性。

赫伦斯坦的分析与其说是为了阐明这个问题，不如说是为了转移人们对美国贫困和不平等的真正原因的注意力。他的理论混合了个人主义和种族主义，很自然地融入了盛行的指责受害者的心态。

虽然赫伦斯坦并不完全认为穷人自己应该为自己的穷困所负责（毕竟在他看来问题出在穷人的基因身上）。但他的理论同时也并没有将贫困归因于任何形式的不公平或不公正，人们之所以贫穷至少是因为他缺乏遗传的认知能力。

这一结论加剧了一种已经流行的保守犬儒主义，这种保守的犬儒主义与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下，人们对人类的政府和社会共同体解决社会问题能力的普遍怀疑相吻合。

事实上，赫伦斯坦不遗余力地质疑那些旨在实现更大平等或改善穷人经济前景的政策实用性。这本质上营造一种氛围，在这种氛围中，**贫困被视为一种准自然现象**。政治议程中没有贫困和不平等问题，一切都来自于人类自身的愚蠢。这导致不平等加剧和持续与贫困的更大结构性力量被忽视。

赫伦斯坦在美国发现的智商和贫困之间的所谓统计关系不是自然的事实，他是**现有经济和政治游戏规则**的偶然产物。改变规则，智商和贫困的关系也同样改变。在不同的制度下，不同的经济和政治结构不同的文化规范和理想、不同的公平观念、不同的劳动力市场运行规则以及不同的社会政策，智商和认知能力在收入和财富分配中，可能会发挥更少或更多的作用。赫伦斯坦认为智力不能提高；**但即使接受这种可疑的说法也并不意味着认知能力低的人注定会贫穷。**

正如《设计不平等》一书的作者所强调的：低智商人群的命运不是由他的基因决定的，而是由社会结构和公共政策决定的，这些是可以改变的。**任何严肃的、关于贫困的这种复杂的社会学 and 经济学现象的讨论，都不应该臣服于资本脚下、成为资本的传声筒，维护一小部分人的超额利益和错位统治；更不该把一切的过错放置于脆弱的个人身上，而应该着眼于分析更大的被遮蔽的社会图景。**

本文引用论文与书籍：

- Peter Knapp et al., *The Assault on Equality* (Westport, CT: Praegers, 1996).
- Richard J. Herrnstein and Charles Murray, *The Bell Curve: Intelligence and Class Structure in American Life* (New York: Free Press, 1994).
- Claude S. Fischer et al, *Inequality by Design: Cracking the Bell Curve Myth*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 Intelligence Genes, and Success Scientists Respond to 'The Bell Curve' (New York Copernicus, Springer-Verlag, 1997).
- Steven Fraser, ed, *The Bell Curve Wars Race, Intelligence, and the Future of America*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5).
- Kenneth Arrow Samuel Bowles and Steven N. Durlauf, eds., *Meritocracy and Economic Inequali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
- Russell Jacoby and Naomi Glaubergerman, eds *The Bell Curve Debate: History Documents Opinions* (New York: Times Books, 1995).
- Joe L. Kincheloe, Shirley R. Steinberg, and Aaron D. Gresson eds., *Measured Lies: The Bell Curve Examined* (New York: St. Martin' s Press, 1996).
- Howard Gardner, *Frames of Mind: The Theory of Multiple Intelligenc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3)
- Robert J Sternberg, *The Triarchic Mind: A New Theory of Human Intelligence* (New York: Penguin, 1988)
- Claude M. Steele and Joshua Aronson, "Stereotype Threat and Test Performance of Academically Successful African Americans," in *The Black White Test Score Gap*, ed. Christopher Jencks and Meredith Phillips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98), 401-27.
- Christopher Jencks, "Racial Bias in Testing," in Jencks and Phillips, *Black White Test Score Gap 55-85*
- Melvin L Kohn, "Two Vis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 and Society: The Bell Curve versus Social Structure and Personality" in *A Nation Divided: Diversity, Inequality, and Community in American Society* ed. Phyllis Moen, Donna Dempster-Mcclain, and Henry A. Walker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34-51.
- Keith E. Stanovich, *What Intelligence Tests Miss The Psychology of Rational Thought*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 Richard E. Nisbett *Mindware: Tools for Smart Thinking*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5) 14.
- Michael Daniels, Bernle Devlin, and Kathryn Roeder, "or Genes and IQ: in Devin et al, *Intelligence, Genes, and Success*, 45-70.
- Marcus w. Feldman, Sarah P. Otto, and Freddy B. Christiansen, "Genes, Culture, and Inequality," in Arrow, Bowles, and Durlauf, *Meritocracy and Economic Inequality*, 61-85.
- Bernie Devlin, Michael Daniels, and Kathryn Roeder, *The Heritability of IQ*, *Nature* 388 (July 31, 1997): 468-71.
- Robert Plomin, "Genetics and General Cognitive Ability," *Nature* 402 (December 2, 1999); C25-C29.
- Eric Turkheimer et al, "Socioeconomic Status Modifies Heritability of IQ in Young Childre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4 no. 6 (November 2003): 623- 28.
- Richard E. Nisbett et a
- "Intelligence: New Findings and Theoretical Developments," *American Psychologist* 67 no.2 (March 2012): 130-59.

Daneels, Devlin, and Roeder, "of Genes and IQ." 64-65. Bruce Bradbury et al, *Two Many Children Left Behind: The u.s. Achievement Gap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York: Russell Sage, 2015), 41.

Timothy M. Smeeding, "Gates, Gaps, and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The Importance of an Even Start," in *The Dynamics of Opportunity in Americas Evidence and Perspectives*, ed. Irwin Kirsch and Henry Braun (New York: Springer, 2016), 261-64

James J. Heckman, "Lessons from the Bell Curv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3, no. 3 (October 1995): 110-11

Richard E. Nisbett, *Intelligence and How to Get It: Why School and Culture Count* (New York: W. W. Norton, 2009), 21-38.

Richard Nisbett "Race, IQ, and Scientism," In *Fraser Bell Curve Wars*, 44-48

Orley Ashenfelter and Celia Rouse, "Scholing, Intelligence, and Income in America," In *Arrow Bowles, and Durlauf, Meritocracy and Economic Inequality* 111.

For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AFQT Fischer et al *Inequality by Design*, 40 4255-69.

Janet Curie and Duncan Thomas,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Intelligence': Down the Slippery Slopes of The Bell Curve," *Industrial Relations* 38 no.3 July 1999) 297- 330.

Douglas S. Massey, "Review Essa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 no.3 (November 1995): 752 and Stephen Jay Gould, "Curveball" In *Fraser, Bell Curve Wars*, 19

Douglas S. Massey See, for example, Sanders Korenman and Christopher Winship, *A Reanalysis of The Bell Curve*, Working Paper No. 5230 (Washington, DC: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1995).

John Cawley et al, *Cognitive Ability Wages and Meritocracy*, In Devlin et al *Intelligence Genes and Success*, 1.80, 190 also John Cawley, James Heckman, and Edward Vytal, "Meritocracy in America: Wages Within and Across Occupations," *Industrial Relations* 38, no. 3 (July 1999); 250-96

Peter Sacks, *Tearing Down the Gates: Confronting the Class Divide in American Educ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115.

Cawley et al, *Cognitive Ability, Wages, and Meritocracy*, 180. also Cawley, Heckman, and Vytal, "Meritocracy in America," 250-96

On Issues of gender and race, Fischer et al *Inequality by Design*, 88-91, 171-203.

Charles Tilly *Durable Inequal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Turkheimer et al, "Socioeconomic Status Modifies Heritability" .Nisbett et al, "Intelligence," 135-37. and David C. Berliner, "Our Impoverished 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Teachers College Record* 108, no.6 (June 2006): 949 -95.

Mark Robert Rank, *One Nation, Underprivileged: Why American Poverty Affects us All*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50.